

主持人语

自 2009 年再次当选以色列总理以来，内塔尼亚胡政府对内坚持和强化以色列的犹太属性，对外消极应付美国与巴勒斯坦的和谈努力，强烈反对奥巴马与伊朗进行谈判并达成核协议。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内塔尼亚胡政府加强与美国的协调与合作，先后促使特朗普对美国中东政策做出多项重大调整：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退出伊核协议，重启对伊朗经济制裁；正式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在 2019 年 4 月举行的新一届议会大选中，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战胜主要竞争对手“蓝白党”，其本人宣称“右翼阵营将在未来四年内继续领导以色列”。本期工作坊旨在分析以色列右翼长期执政的国内外深层原因，及其对以色列内政外交的影响，探讨以色列的国家定位与未来发展走向。

西北大学教授雷钰指出，一旦内塔尼亚胡组阁成功，第五次出任以色列总理的他就有可能打破本-古里安总理 4875 天的任期记录，成为以色列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总理。

以色列海法大学教授 Uri Ben-Eliezer 认为，建立犹太国家是以色列右翼与左翼共同的目标。左翼对于分治方案只是假意接受，实际上希望首先建立国家及军队，再借此集聚力量获取全部领土。右翼高度强调领土的神圣性，并愿意为此采取各种非法手段，破坏民主。过去几年中，以色列右翼丢弃了民主的要素、质疑多元化思想、甚至攻击言论自由，变成了狭隘的民主国家，法治逐渐被破坏。内塔尼亚胡之所以受到保护，正是因为他是族裔民族主义传统的代表。

南京大学教授宋立宏表示，犹太世界内部近几十年来最

重要的发展恰恰在于基要主义者人数虽然不多，却越来越有办法和能力左右现代正统派的见解和价值观。当前犹太基要主义一个标志性特点在于，文本在当前犹太宗教生活中的规训功能越来越重要，乃至压倒古已有之的犹太习俗。

北京大学副教授王宇认为，以色列社会的主要矛盾实际是世俗和宗教势力之间的对立，在政治上突出表现为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免服兵役的问题。大部分犹太宗教人士反对世俗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世俗以色列国家，认为破坏了神的进程。宗教复国主义则是服兵役的，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持短期合作的态度，将世俗的以色列国家当做神圣计划中的一部分。

上海外国语大学副教授杨阳指出，巴以双方接受或拒绝“世纪协议”取决于几个条件，即协议是否满足了敌对双方的最低要求；主要阿拉伯国家领导人是否支持美国的努力；特朗普政府能否对巴以双方施加更多影响力；巴以双方的内部形势是否允许各自接受该计划。在这些条件中，巴以双方内部政治形势的变化将对世纪协议的成败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

希伯来大学教授 Hillel Cohen-Bar 认为，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不能将宗教因素排除于政治问题。在以色列人或巴勒斯坦人各自的话语体系中，宗教而非国际法占据了核心地位。犹太人和穆斯林在为自己的权益斗争时，并不是因为联合国的决议，也不是关于物质性因素，而是因为宗教的原因。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余国庆认为，以色列要争取最有利的美国版中东和平计划“世纪协议”的落地，为下一个 70 年或者为今后以色列国家的发展创造一种更加优化的安全环

境。

清华大学助理教授余纲正表示，特朗普亲以政策的终极目标并不是犹太选民票数，而是要稳固上一次大选中的基本盘，因为基督教福音派以及大部分美国人仍同情以色列。特朗普政府目前认为阿拉伯世界分化，尤其海湾国家对伊朗的恐惧，可以降低戈兰高地承认问题的冲击，但如果进一步采取极限施压，对以色列的支持突破了阿拉伯世界承受的底线，可能最后会反噬白宫围堵伊朗的努力。

综上，内塔尼亚胡带领胡利库德集团于过去 10 年连续在以色列政坛执政，以色列社会变得日益右倾和保守，宗教政党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不可避免地对巴以和谈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即便内塔尼亚胡不再连任以色列总理，被蓝白党领袖甘茨取代，在美国政府持续偏袒以色列的背景下，特朗普的“世纪协议”也很难有所作为，不可能为巴以之间带来持久和平。中国政府没有必要改变支持两国方案的基本立场和支持巴勒斯坦建国的既定政策。

以色列国内的右倾化和保守化现象是以色列国内政治及社会矛盾激化的体现，对巴以和谈与和平造成了负面影响。中国公共传播应客观报道，以理性态度对待，不必过分渲染和批评，以免形成“以色列坏”和“巴勒斯坦好”的舆论，从而干扰中国在巴以之间不偏不倚的外交政策。

王锁劳

2019年6月1日

“博雅工作坊”第 19 工作间

以色列的国家定位及发展走向

2019 年 5 月 24 日

本期博雅工作坊由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王锁劳副教授牵头，来自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海法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京大学、西北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高校与研究机构的中外专家学者与会研讨。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钱乘旦在致辞中表示，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成立一年以来举办了许多学术活动，博雅工作坊已举办了近 20 期，希望通过专题报告和学者对话的方式推进我们对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了解，从而对中国的区域研究起到促进作用。此次关于以色列国家定位以及发展走向的工作坊即是针对当前以色列的一些政治和社会变化所做的学术思考和研讨。

王锁劳副教授指出，作为一个兼具综合性、交叉性和跨学科性的研究机构，北大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所关注的议题并非基于某个特定的学科，而是希望邀请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问题进行讨论，寻找其根源，发掘更多的内涵。基于这样一种考虑，此次工作坊邀请的专家学者涵盖政治学、国际政治学、宗教学、历史学及社会学等学科。此次工作坊关注在中东变局的大背景下以色列自身的定位及未来发展。中东地区先后经历了“阿拉伯之春”，伊斯兰国的崛起，伊核协议的达成与美国的退出，局势非常紧张；以色列是中东非常重要的国家，在中东局势中一直扮演着非常重

要的角色。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 2009 年当选以来的十年间，以色列国内同样发生了重要变化。2018 年以色列通过了犹太民族国家法案作为其基本法之一；在前不久的议会选举中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政党再次胜选，且公开宣称未来四年仍是右翼政府主导的格局。基于此，本次工作坊的主要议题是：以色列究竟会往哪个方向发展？其自身的国家定位是什么样的？以色列少数族裔和团体未来会享受怎样的地位和待遇？此次参会的专家学者都曾经在以色列学习、工作、生活过，包括两位来自以色列的著名教授：海法大学社会学系主任 Uri Ben-Eliezer 和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伊斯兰和中东学系主任 Hillel Cohen-Bar，希望各位专家学者能够就相关主题进行深入而富有成效的讨论。

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雷钰的发言题目是《从 2019 年大选看以色列政坛的走向》。她首先介绍了以色列议会选举的制度框架：以色列是一院制议会，全国为一个单一选区，设有 120 个席位，任期是四年。历史上仅有两个总理完成过四年任期，一个是梅厄夫人，另外一个为贝京总理，其余均提前举行大选。以色列是不折不扣采取比例代表制的国家，根据各党派所提出的候选人名单在全国范围内所得总票数的比例分配议席。

雷钰认为，以色列 2019 年大选主要有四个特点。一是利库德集团和蓝白党难分伯仲，分别获得了 35 个席位，表明两极趋于平衡状态。这在以色列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出现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以色列的选举改革将议会议席分配的得票率起点由 1.83% 提高至 3.25%，这有利于大党派的形

成，由此造成了两大党派平分秋色的格局。

二是犹太极端正统派基础稳固。统计数据显示，极端正统派是以色列的穷人，阶层人数比较稳定，主要阵营沙斯党及圣经犹太教联盟获得的选票及席位的数量也比较稳定。然而这也是以色列国内非常尖锐的矛盾，此次内塔尼亚胡内阁倒台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极端正统派宗教方面的矛盾。

三是以色列阿拉伯人对其政党的支持率下降。数据显示，2006年至2019年的五次大选中，阿拉伯政党获得的选票从相对数量上看是逐渐下降的。与占总人口20%的阿拉伯人口数量相比，其政党所获席位仅占10%，在议会中属于比较少的。并且议会选举结果出来后，阿拉伯政党放弃推选自己的候选人，所占的10个席位不参与总理任职的竞争，这也是一个特例。

四是组阁难。此次大选竞争非常激烈，参加选举的党派数量首次突破40大关，最终11个政党进入议会。由于以色列制度方面的原因，组阁是相当难的，需要解决关于部长席位的分配等很多技术方面的问题。目前组阁迟迟无法完成，在28天组阁期满后又延长了两周至。现在内塔尼亚胡还在做最后的冲刺，一旦他组阁成功第五次出任总理，就有可能打破本-古里安总理4875天的任期记录，成为以色列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总理。

以色列海法大学社会学系主任 Uri Ben-Eliezer 的发言题目是《为何以色列人难以与巴勒斯坦人实现和平？社会学视角中的以色列右翼》（*Why is it Difficult for the Israelis to Make Peace with the Palestinians? The Israeli Right-Wing in*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他指出，在内塔尼亚胡遭到腐败指控的情况下，以色列右翼政党仍取得选举胜利，甚至试图采取措施使内氏免受指控。以色列人如此保护内塔尼亚胡与他们特殊的民族性有关。

Eliezer 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的“乌干达危机”反映出两种对立的民族主义。一种是公民民族主义、自由民族主义或国家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认为民族与国家是一体的，国家创造了民族，民族代表了不同种族、宗教、性别和族裔之间自愿的契约。另一种则是族裔、文化的民族主义，是以先人的血缘世系及自古就作为祖国的特定领土为共有联系。总体而言，族裔民族主义在以色列处于中心地位，以色列右翼拥护极端族裔民族主义到了不惜违反法律的程度。

以色列的国父们被称为“第二次回归”的移民（*Second Aliyah*），他们强调以族裔为中心，以至于拒绝与阿拉伯人一起工作。对他们而言，土地神圣不可分割，且只属于犹太一个民族。巴勒斯坦人当然要拒绝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计划，于是从 1920 年起民族冲突就此开始。也是在这个时期，主张采用更加激进的方式建立犹太国家的右翼势力出现了。

值得注意的是，建立犹太国家是右翼与左翼共同的目标。左翼的社会主义领导人同样是族裔民族主义者，相信民族是由历史决定而并非个人选择的结果，领土主权不可分割，最终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目标将由军事手段达成。因此，对于分治方案左翼只是假意接受，实际上希望首先建立国家及军队，再借此集聚力量获取全部领土。与左翼循序渐进的方式不同，右翼显得缺乏政治理性，高度强调领土的神圣性，并

愿意为此采取各种非法手段，破坏民主。

直至 20 世纪 50 年代，占领全部以色列圣地的计划仍旧存在。1967 年战争后，以色列终于成功占领了其中的一部分，“以色列圣地”与“以色列国”的区别进一步缩小，族裔民族主义达到巅峰。1977 年成为了以色列历史上另一个转折点，右翼政党首次赢得选举，新政府使用国家力量继续对这些土地实施兼并。

然而到了 80 年代，以色列内部发生变化，领土问题日趋复杂化。一方面，自由的公民社会在以色列产生，强调个人意愿与自由、私人化及最小的国家干预；与此同时，公众对 1982 年黎巴嫩战争及 1987 年第一次因提法达运动（Intifada）产生诸多批评，认为军事未能解决政治问题，占领也并非不可逆转，因此转而支持奥斯陆协议。这表明以色列正在转向公民、自由和国家民族主义。另一方面，宗教弥赛亚和基要主义运动同时出现，他们鼓励犹太教徒基于圣经开拓新的定居点，甚至反对以色列政府以安全需要为其背书。随后，因公民社会支持的 1993 年奥斯陆协议及 2000 年戴维营和谈均宣告失败，犹太基要主义者的反国家势力不断增强。事实上，任何以色列政府都难以挑战基要主义定居者，因为他们将自己定位为族裔民族主义和犹太教的真正代表。

Eliezer 指出，在过去几年中，以色列右翼丢弃了民主的要素、质疑多元化思想、甚至攻击言论自由，变成了狭隘的民主国家，法治逐渐被破坏。内塔尼亚胡之所以受到保护，正是因为他是族裔民族主义传统的代表：将“大以色列”的概念置于政治、民众意愿甚至法律之上。这不得不让人怀疑，

在极端族裔民族主义和宗教民族主义占优势的情况下实现和平的可能性。

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宋立宏的发言题目是《犹太基要主义与以色列国》。他表示，犹太复国主义这种世俗意识形态塑造了以色列社会的中流砥柱，在建国前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通过与传统犹太教断裂来界定自我，并以此为豪。但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改变，宗教已经回到了以色列的公众生活中。

以色列信教的犹太人都是正统派，基本可以分为两派，一派是现代正统派，将传统当作个人的选择和行为方式，不会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另一派则是极端正统派，较为中性的希伯来文称其为哈瑞第，意思是“因神的话语而‘颤栗’的人”，这一派全都是基要派。宋立宏认为，犹太世界内部近几十年来最重要的发展恰恰在于基要主义者人数虽然不多，却越来越有办法和能力左右现代正统派的见解和价值观。以色列现代正统派很大程度上已沉湎于哈瑞第的意识形态，视定居在古老的犹太家园约旦河西岸为最重要的诫命和笃信犹太教的必要条件，其政治经营策略也偏向好勇斗狠。

从外部的一种世俗视角来看，哈瑞第作为整体与以色列社会和政府进行互动，似乎是有着共同价值观的社会群体；但从内部视角来看，他们更像是一种社会类型（social type），而非一个教派（sect）。更确切地说，哈瑞第内部教义存在颇多分歧，权力结构松散、各自为政，没有一个中央机构协调他们之间彼此统一的行动和立场。今天的哈瑞第分为三个群体：一是哈西德人，极端抵制世俗文化和现代文化，其源头是 18 世纪在东欧发起的注重灵修而非研读传统文本的虔诚

运动。二是“反对者”(mitnagdim),因反对哈西德人而得名,其世界观没有哈西德人那么封闭,更注重传统的文本学习。在此次以色列大选中以上两派哈瑞第人都集中在托拉犹太教党中。三是中东犹太人,即以前生活在伊斯兰世界中的犹太人,他们认同沙斯党,文化保守,更多以族群为导向,宗教立场没有那么僵硬。可以说,上述三个群体在族性构成、文化传统及对外立场上很难一概而论,但是作为基要主义者仍有一些家族性的相似。

综上所述,当前犹太基要主义的一个标志性特点在于,文本在当前犹太宗教生活中的规训功能越来越重要,甚至压倒了古已有之的犹太习俗。当代宗教社团日益依赖法典以及各种评注著作指导和解决现实问题的风气最早在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形成,文本被赋予前所未有的权威性,书本传统盖过了生活传统。

当代基要主义特点的形成原因非常复杂,其中经学院的发展是促成哈瑞第世界观的内部制度性因素。今天以色列的经学院,经历了从培养精英和社团领袖的学术机构到培养犹太世界观、锻造犹太身份的宗教机构的转变。与西欧和美国哈瑞第不同,以色列哈瑞第存在大规模脱产读经的现象。

为应对这个问题,本世纪初以来以色列政府已经采取措施,从就业意愿、渠道、技能、补贴等各个方面加以引导,鼓励哈瑞第就业,希望改变哈瑞第人口的贫困状况,引导哈瑞第参与世俗国家的经济建设,弥补以色列世俗力量和宗教力量的鸿沟。但是,这些政策难以实质性地缓解政教矛盾。首先,政府的各种措施缺乏优先级考虑,思路并不明确,难

以解决动力问题，特别是犹太律法上的限制。其次，现有的就业促进模式下，哈瑞第女性的就业意愿显著高于男性，这实际上强化了哈瑞第工作观，并不能拉近哈瑞第犹太人与现代社会的距离。同时，在哈瑞第群体中，高新科技等领域的职业因不用与外界接触且收入高，越来越受欢迎，但更有可能强化已有的分离主义姿态，削弱政府的社会整合力量。第三，政策缺乏连贯性和执行力。哈瑞第在政治领域中持续发力，身居要职的教派成员难以同意放弃既得利益，未来政策将出现反复。最后，一些学者指出，现代基要主义在反抗现代世界的斗争中经常吸收和利用现代成分，就业本身在哈瑞第眼中只是使他们更好地践行哈瑞第价值观的一种手段。

宋立宏认为，基要主义兴起的一个外部因素，是 19 世纪末以来犹太人口的大规模流动。流动实际上意味着传统的移植和调整，也意味着不同代际犹太人对犹太传统必然产生不同的理解。经学院功能的转变应运而生，目的是在世俗化大潮冲击下挽狂澜于既倒，转向文本寻找精神安顿，寻找理解当下困境和难题的解决方案，重新塑造和巩固犹太认同。

面对周围阿拉伯国家的敌视，西方国家越来越强烈地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抵制以色列运动。犹太基要主义者无法摆脱不安全感 and 精神困顿，因此转向书本的动力会越来越强大。同时，内塔尼亚胡如果要完成组阁，就必须联合哈瑞第政党，这些宗教政党必然会开出更高的条件。基要主义扩张将可能是以色列政府长期面对的一个基本性问题。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王宇的发言题目是《以色列国内主要矛盾的政治体现——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兵役问

题的拉锯战》。她认为，以色列社会的主要矛盾实际上是世俗和宗教势力之间的对立，在政治上则突出表现为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免服兵役问题。尽管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在 2011 年才被全民关注。当年以色列爆发了针对高物价、高房价的大规模抗议活动，要求社会公正，直指在以色列拥有诸多特殊权利的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免服兵役问题作为一个突破口，成为世俗和宗教势力角力的舞台。

免除兵役的传统可以追溯到以色列建国前。在 1948 年战争爆发之前，考虑到经学院学生刚经历过纳粹大屠杀，以及战后的犹太传承问题，经学院的学生被免除兵役。建国后本·古里安总理应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宗教党的要求免除了部分经学院学生的兵役。然而，因存在道德不公正的问题，所以将享受这一特权的人数限定在 400 人，并且严格要求他们将所有的时间精力用于学习《圣经》，不允许干任何其他工作。1968 年，摩西·达扬担任国防部长，将特权人数增加到 800 人。最大的变化发生在 1977 年，利库德集团首次执政，承诺免除以读经为职业的人的兵役，且取消了人数上限。世俗人士对此愈发不满，起诉至以色列最高法院但最终败诉。直至 90 年代宪法革命后，最高法院拥有了违宪审查权，于 1998 年裁定国防部免除经学院学生兵役不合法，如要免除需设立相关法律。2002 年著名的 Tal Law 法案通过后，被免除兵役的经学院学生人数一度超过 6 万，法案完全成为极端正统派教徒免服兵役的工具，引发更多人的不满。2012 年以色列高等法院裁定 Tal Law 法案违宪，给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执政联盟带来危机。“以色列是我们的家园”党和沙斯党在新

的兵役法案上观点相左，针锋相对，均威胁退出执政联盟，幸而“前进党”加入执政联盟，稳定了政局。但两个月后，以色列内阁仍因此事垮台，大选提前进行。

这次大选受 2011 年后大规模社会抗议运动的影响，许多关注社会经济诉求的新政党入阁，十多年来首次建立了没有极端正统派宗教党的执政联盟。2013 年，《平等义务法案》通过，规定法案通过当天年满 22 岁的极端正统派彻底免服兵役；18 岁至 22 年之间可以逐年免服兵役；18 岁以下则应从 2017 年开始服兵役或以其他社会形式代替服兵役。同时为了鼓励极端正统派就业，将原本规定不服兵役则不可以工作，改为免除兵役的人可以不受限制工作。这一看似优厚的法案引起了哈瑞第的极端反对，甚至引发暴力冲突。

2015 年因内塔尼亚胡执政联盟破裂，以色列再次进行大选。此次大选后内塔尼亚胡建立了一个包括所有宗教党派在内的右翼执政联盟，《平等义务法案》被废止。宗教党派遂就兵役问题提出自己的法案，但在 2017 年 12 月又被最高法院宣布为违宪，极端正统派的兵役问题一直悬而未决。2018 年内塔尼亚胡因无法弥合执政联盟内部分歧而再次宣布提前进行大选，在 2019 年的大选中，影响以色列执政联盟建立的关键之一仍是世俗派与宗教党之间关于兵役问题的博弈。

哈瑞第如此激烈地反抗服兵役与以色列宗教和国家的关系有关。按政治倾向划分，哈瑞第可以分为复国主义的犹太教徒、非复国主义的犹太教徒和反复国主义的犹太教徒。大部分犹太宗教人士反对世俗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世俗

以色列国家，认为破坏了神的进程。宗教复国主义是服兵役的，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持短期合作的态度，将世俗的以色列国家视为神圣计划中的一部分。

王宇认为，宗教党包括犹太教的影响力在以色列社会呈上升趋势。他们有极高的生育率和人口增长的速度，且形成了较为固定的社团，不仅阻止了哈瑞第社团向外的流失，更因哈瑞第社团享有的特权吸纳了更多人。此外，极高的投票率和政治参与度给予他们底气，由于他们参加了历届以色列政府的执政联盟，可以和执政党讨价还价从而获取利益，因此在政坛有强大的势力。2019年4月大选后，宗教党以高票入阁，表明他们的势力会越来越大，兵役问题由此也难有进展。

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语学院副教授杨阳的发言题目是《世纪协议出台前的巴以内部形势》。他指出，目前特朗普仍未公布世纪协议的内容，巴以前景仍不乐观，双方各自内部的政治形势对世纪协议能否被接受有重要影响。

据了解，美方表明即将出台的世纪协议将涉及包括边界、定居点、安全安排、耶路撒冷和难民问题在内的所有问题，希望巴以双方都能以此为基础开展进一步谈判。杨阳认为，巴以双方接受或拒绝该协议取决于以下几个条件：

首先，该计划是否满足了敌对双方的最低要求。对于巴方来说，该计划至少需要承诺巴勒斯坦建国；巴以双方以1967年边界线为基础，进行一些领土交换以最大程度保持巴勒斯坦领土的连贯性；承诺巴勒斯坦国的首都为东耶路撒冷地区，并在其主权管辖之下。对于以色列来说，协议应满足

以色列的安全关切，确保以色列的人口组成以及作为一个犹太国家存在；边界谈判必须考虑到大型定居点的存在，保持耶路撒冷的统一，保证以色列可不受阻碍地进入其各个区域、居民点和宗教圣地。

其次，主要的阿拉伯国家领导人是否愿意支持美国的努力，使巴以双方接受这一计划，至少以此作为进一步谈判的基础。如果巴方的最低要求得不到满足，阿拉伯领导人不太可能支持这一计划，否则会被指责为背叛了巴勒斯坦事业。

第三，特朗普政府能否对巴以双方施加更多影响力。特朗普对巴勒斯坦方面的惩罚持续已久，巴方知道如果立即拒绝美国的倡议可能会面临更多惩罚，导致其经济状况继续恶化，自治机构领导地位不稳。以色列方面已从特朗普的单方面行动中收益良多，担心如果断然拒绝其和平倡议，既得利益有被反转的可能。此外，特朗普政府也有一些激励性措施选项：如能促成释放所有巴勒斯坦囚犯，允许巴人进入以色列劳务市场，将大大增加巴方接受倡议的可能；为以色列提供防务协定，促进周边阿拉伯国家与巴以共同协商经济发展计划等。

最后，巴以双方的内部形势是否允许各自接受该计划。多数巴勒斯坦人质疑特朗普和平倡议的公平性，对于该计划的态度日趋强硬。同时，迟迟难以弥合的内部分歧也令巴勒斯坦难以对可能的和平计划作出连贯反应，阿巴斯的合法性会受到质疑；哈马斯态度负面，甚至可能出现新一轮的暴力举措以阻止接受和平倡议。不过，也应该看到积极的因素，如巴勒斯坦内部的力量对比仍有利于世俗民族主义者，且阿

巴斯有效地控制着法塔赫，对于和平协议以及与以色列实现和解保持温和立场。巴勒斯坦的安全力量仍保持强大和有效，与以色列的安全和情报部门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安全合作。

以色列的内部环境对于重启和谈而言也可谓麻烦不断。以色列人对两国方案的支持度已从 2006 年的 68% 降至 2018 年 6 月的 49%，18-24 岁的年轻人是最不支持两国方案的群体。1993 年奥斯陆协议以来屡屡失败的和平努力以及不断爆发的暴力冲突使两国方案支持者的信心持续下降，反对者们则表现出了更强的投入精神，更高超的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这也体现在 2019 年的大选中，利库德及蓝白党都尽力避免提及支持两国方案，表明即使是以色列政治版图中的中间派也不再将承诺要在两国方案基础上达成和平协议作为其主要的竞选纲领。尽管利库德和蓝白党在选举中看似平分秋色，但总体而言，中右翼支持者的支持强度大于中左翼支持者，利库德集团仍占优势。

内塔尼亚胡的去留也将给世纪协议带来不确定性。如果这位富有魅力的领导人下台，将是对右翼势力的沉重打击，将开启利库德新领导人的竞争。新的竞争者可能倾向于更强硬，以显示自己是能接替内塔尼亚胡的真正的右翼领导人。

希伯来大学伊斯兰和中东研究系主任 Hillel Cohen-Bar 的发言题目是《宗教和圣地在巴以冲突中的角色》（*The role of religion and holy places in the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这一发言是从宗教和历史的角对巴以问题进行解读，而非国际关系角度，更多关注人们的情绪，人们在想什么。Hillel Cohen-Bar 认为，政党的决定和行为基于人们的情绪，当前

很多问题都与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各自的宗教因素有关系。

Hillel Cohen-Bar 从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信徒对于宗教的认知展开。犹太教和伊斯兰教都是一神教，认为唯一的神创造了世界并观察着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和每个个体的行为。根据犹太教的教义，神创造了世界，亚伯拉罕发现了神，他有两个儿子，以撒和以实玛利，以撒是犹太教的祖先，以实玛利是伊斯兰教的祖先。古兰经也认为犹太人是被选中的人，但不同的是，在特定的一段时间双方产生了分歧。例如古兰经认为，犹太人也是神的选民，但因为犹太人不遵守神的旨意而没有权利居住于圣地；如果犹太人遵守神的旨意，他们可以继续居住于圣地。古兰经中记载，当犹太人再次被驱逐时，犹太人没有权利返回圣地，失去了成为神的选民的资格。在 620 年，神将先知默罕默德送到世界，穆罕默德将古兰经带到世界，在此神的选民的想法被放弃，所有人都是平等的。穆罕默德试图说服犹太人他也是犹太人的先知，一些犹太人接受了这个想法，但大部分拒绝接受；穆罕默德驱逐甚至杀害了这些不接受他为先知的犹太人。这就是两个宗教关系的开端。在很多地方，犹太人在穆斯林统治下生活，并且拥有少数民族的身份，这意味着穆斯林不能强制犹太人信奉伊斯兰教，但犹太人要接受穆斯林的统治身份，这是两个宗教间达成的一致。

Hillel Cohen-Bar 认为，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不能将宗教因素排除于政治问题，宗教是政治的基础。在以色列人或巴勒斯坦人各自的话语体系中，宗教而非国际法占据了核心地位。犹太人和穆斯林在为自己的权益斗争时，例如定居点问

题或边界问题，并不是因为联合国的决议，也不是关于物质性因素，而是因为宗教的原因。现在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没有和平，是因为对于他们而言和平并不是最重要的价值；即使认为和平是最重要的，双方对“和平”的理解也不同。对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而言，“和平”就是按照上帝的道路行事，但显然对于各自的地位却有不同规定。谈论和平是简单的，达成和平是困难的，但并非不能找到合适的道路，只是我们必须了解最深层的情绪因素。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余国庆的发言题目是《以色列安全环境和安全政策分析》。他首先通过地图简要介绍了 1948 年至 2019 年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双方领土范围的变化，尤其是戈兰高地的基本情况。在此背景下，将以色列的安全环境和安全战略的演变划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 1948 年到 1967 年，是以领土扩张确保生存的阶段。以色列人用先发制人的手段发动苏伊士运河战争和第三次中东战争，并在战争中最大限度夺取和占领阿拉伯国家的领土以确保安全；通过建立与第三世界国家的联系，谋求国际社会的承认，扩大国际生存空间，增强自身国际地位。

第二个阶段从 1967 年到 1991 年，是以领土换谈判的阶段。1967 年战争后，以色列以占领空前规模的阿拉伯国家领土作为筹码对阿拉伯国家分而治之，单独跟埃及实现了和平，同时开始正视巴解组织这一力量，同时以军事优势为保证，获取全面的军事优势和核武器能力，对邻国的核设施和动向进行打击。更重要的是，以色列和美国结成了特殊的战略盟友关系。

第三阶段是从 1991 年到 2000 年，是以土地换和平的阶段。以色列参与了中东的多边和谈和巴以美三边会谈，包括马德里和会、1993 年奥斯陆协议签订及 2000 年戴维营和谈，推动巴勒斯坦自治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然而，戴维营和谈的失败打击了以色列国内的和平力量，导致以色列政坛右倾化的趋势。

第四个阶段为 2000 年到 2016 年，是以安全求和平的阶段。这一阶段巴以和谈进入僵局，同一时期非国家实体的极端武装势力开始威胁以色列的国家安全，阿拉伯之春和随之而来的中东动乱也使得以色列安全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一阶段强硬的以色列国家领导人主导国家安全战略，不主动与阿拉伯国家谈判，打击巴勒斯坦强硬派别，强调任何和平谈判与方案都必须保证以色列的安全。

第五阶段是从 2017 年至今，是以色列战略和安全的优化阶段，即以联盟谋安全。特朗普执政美国后，美以关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改善。以色列一方面全面提升与美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利用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以及以色列拥有对戈兰高地的主权。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以色列将遏制和打击伊朗作为重要选项，同时为了优化国内的环境，与沙特阿拉伯等温和阿拉伯国家改善关系。以色列要争取最有利的美国版中东和平计划“世纪协议”的落地，为今后以色列国家的发展创造更加优化的安全环境。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助理教授余纲正的发言题目是《美国中东政策转型的动机及其对以色列未来发展的影响》，主要从美以关系角度梳理了目前的进展和未来可能发生的

情况。他认为，美以关系是以色列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同时以色列对美国的重要性也远高于日本、澳大利亚等其他盟友。

余纲正首先介绍了戈兰高地问题。由于叙利亚动乱旷日持久，叙南部地区在政府军和非政府军之间反复易手，多个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又参与其中，以色列担心伊朗或其支持的真主党会以叙利亚为跳板攻击戈兰高地甚至以色列北部其他地区，因此以色列国内的左、中、右派竞相表态绝不放弃戈兰高地的主权。从 2015 年开始，以色列就向美国要求承认戈兰高地主权属于以色列，但奥巴马拒绝了这一诉求。特朗普上台后毫不掩饰其对以色列的大力支持，于 2019 年宣布戈兰高地属于以色列，其理由是：1967 年后戈兰高地就被以色列有效控制，伊朗的挑衅以及真主党恐怖集团的活动很有可能使戈兰高地成为下一个攻击发起的起点，因此和平条约达成之前美国承认戈兰高地属于以色列是合理的。

特朗普在 3 月突然公开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主要原因是要支持他在以色列的中右翼政治盟友，尤其是深受贪腐调查困扰的内塔尼亚胡，使其能在议会选举中获得胜利。这一战术是有效的，最终利库德集团和右翼政府共同获得了超过半数的选票。

特朗普深层次的考虑则是利用以色列牵制伊朗在叙利亚的势力，确保美国能够以较低的成本维护其在中东的战略利益。特朗普的上台代表着美国民众要求将更多精力从海外转移到国内，他对以色列领土方面大力的支持反应了美国目前在中东需要一个稳定可靠的盟友，确保美国大部分军队撤离后，继续对叙利亚政府军和俄罗斯、伊朗保持有效的威慑。

特朗普更为根本的目的则是投美国全民之好，确保自己在 2020 年大选中能够连任。特朗普参选美国总统以来，共和党一直在争取犹太选票，实现所谓的“犹太人出走”。但特朗普亲以政策的终极目标并不是犹太选民票，而是要稳固在上一次大选中的基本盘，因为基督教福音派以及大部分美国人仍对以色列保有同情。

从国际层面看，特朗普的这个决定肯定会损害美国一直标榜的调停者形象。美国一直宣称不应以战争手段争取领土，却支持以色列拥有戈兰高地主权。中国、欧盟、俄罗斯及许多中东国家对此提出了抗议，尤其是沙特和其他海湾国家对这个政策表示强烈不满。特朗普政府认为，阿拉伯世界的分化，尤其是海湾国家对伊朗的恐惧，可以缓解戈兰高地承认问题带来的冲击。然而，如果进一步采取极限施压，对以色列的支持一旦突破阿拉伯世界承受的底线，反而会反噬白宫围堵伊朗的努力，不仅影响海湾局势，还可能会激发更多反美情绪，长远来看更会伤害以色列和美国的国家安全，给地区和世界局势带来更多负面影响。

讨论环节中，与会学者就内塔尼亚胡胜选的原因，以色列未来的走向，以及宗教因素在巴以冲突中的角色等问题发表观点，深入交流。

王锁劳：为什么内塔利亚胡在受到诸多指控的情况下，仍赢得选举？

雷钰：尽管有很多指控对内塔尼亚胡不利，但他在以色列还是非常得民心的。内塔尼亚胡执政的 2009 年至 2019 年被视为以色列的黄金十年，以色列走向了新的辉煌，GDP 增

长了 7%，只要经济搞上去了，他就会得到更多人的欢迎。另外内塔尼亚胡也被以色列人称为“安全先生”，他曾声称自己是唯一有资格保卫以色列安全，引导国际关系的候选人，而以色列人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安全问题，所以他的感召力仍非常强。

Uri Ben-Eliezer: 我不确定右翼政党胜选的原因是以色列人对安全议题的关注，因为蓝白党同样将安全放在重要位置。我认为两党之间的区别在于对被占领土的最终处置上，右翼政党不放弃这些领土，而中左翼在一定情况下则会做出妥协。以色列民众在第二次因提法达之后丧失了和平的信心，他们出于安全或者宗教的考虑，不希望以色列政府放弃这些领土，因此在选举中选择了右翼政党。

余国庆：如果从宗教或者从文化认知的角度看，以色列正变得越来越宗教化，或者说越来越保守，给人更加右倾、更加强硬的印象。以色列要想在中东长久地存在下去，它的国家政策会不会有一种转向？

宋立宏：以色列极端正统派的政治势力越来越大，与全球整个态势是吻合的。极端正统派在伊斯兰世界，在中东甚至在很多我们认为世俗化很高的国家例如美国中在兴起。这种兴起恰恰是利用了现代社会文化多元主义，因为多元主义不断鼓励少数群体发声，反而促成了少数群体日益分离、日益孤立的倾向。这种趋势至少在目前看不到有缓解和改变的迹象，因此更加值得注意。

王宇：中东和平、巴以进程等问题完全从以色列公众关注的地方消失了。大家关心的是安全、民生，关心宗教势力

对世俗势力的蚕食等内部问题。这可能和目前的国际环境有关。现在阿拉伯世界四分五裂，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以色列的偏袒又达到一定的高度，以色列没有生存压力。如果外界不发生重大变化，比如说以色列在某次战争中失败了，这一情况不可能有太多改变。

听众：20 世纪 70 年代起，一些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new Historians)对巴以冲突进行了新的解读，而这些解读与以色列官方解读存在一些冲突。请问 Hillel Cohen-Bar 对这些解读的回应是什么？

Hillel Cohen-Bar：我对于这个问题的回应是，学校的历史教学总是倡导自身是好人，对手是坏人，但战争是复杂的，我们没法从单一一方的视角解读。从以色列的视角看，我们有权力占有圣地，老派的历史学家正是从这个角度对历史进行解释。但新的历史学家则偏向另一个角度，他们认为犹太人对巴勒斯坦人进行了大屠杀，而这些没有写进历史书；联合国 1947 的决议是否合法也不是很清楚。这些新派的历史学家认为，巴勒斯坦人的一些观点是正确的；犹太复国主义是正义的运动，只是在这个过程中存在一些错误。这些不能改变对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理解，改变的仅仅是关于 1948 年战争的叙事方式。

Uri Ben-Eliezer：1940-1980 年代期间的历史学家被认为是建国运动中的一部分，他们选择性地讲述历史，忽视了巴勒斯坦灾难日（Nakba）、难民等一些问题。而新派的历史学家试图对历史进行修正，开始研究这些议题，例如他们对难民问题尤其是难民的数量有争议，去很多城市和乡村做很多

研究，查阅之前被封禁的材料，得出新的结论。我个人认为难民的数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以色列政府并不允许他们回归。

关于宗教在巴以冲突中的角色，与会者也展开了争论。

Uri Ben-Eliezer: 18 世纪开始，欧洲发生了重大转变，被称为“解放 (emancipation)”，许多欧洲人放弃了宗教信仰。犹太人也受到影响，在除波兰外的其他国家，许多犹太人变得世俗化，其中一些人还发展出了新的意识形态，即民族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只是民族主义的一种形态。总的来说，民族主义在世俗化的犹太人中是很活跃的，我认为多于 50% 的犹太人是非宗教的，他们以自己的世俗化为豪。我的父亲是世俗的犹太人，同时是一位研究圣经的教授，因为犹太复国主义为圣经带来了新的注解。虽然无神论的犹太人与信仰犹太教的犹太人对圣经有不同的解读，但他们保留了作为犹太人的德性。

犹太人建立自己的身份认同是因为所处的环境不接受他们。我的家族 1882 年从乌克兰移民到巴勒斯坦，当他们在乌克兰时，虽然不信仰犹太教，但也不被认为是乌克兰人。纳粹同样将很多世俗化的犹太人送到集中营。我认为 Cohen 教授夸大了宗教因素在巴以冲突中的作用，宗教因素很重要，但情况更复杂。在我看来民族主义更为重要，甚至更具破坏性。我想提醒各位，奥斯陆协议时期，可能除了哈马斯外的大多数巴勒斯坦人，都同意两国方案。所以这个问题可能不仅仅取决于宗教。

Hillel Cohen-Bar: 关于犹太民族主义、巴勒斯坦民族主

义及其与宗教的关系，我认为没有世俗的犹太教(Judaism)，没有宗教也就没有犹太民族主义运动，无论在人口意义上还是从思想上来说世俗犹太人或无神论犹太人正在消失。我并非认为他们无权存在，而是现在以色列的政治和社会的主要动力是宗教，这是一种过程。在欧洲，有时犹太人被其他族裔定义为犹太人并非出于宗教考虑，有部分犹太人确实被同化了。但重点是他们回到圣地之后发生了什么：他们开始说希伯来语，开始说圣经的语言，开始从原始文本学习圣经，探讨统治中的社会正义。但这带来了问题，因为圣经由 24 本书组成，而大部分都是关于犹太人的优越性，犹太人的应许之地，其他人应该服从犹太人或者被驱逐；而当世俗犹太人只接受一部分圣经时，他们就失去了完整性。这也为圣经的学习，尤其是在基础教育阶段带来了困难。这（世俗犹太人与犹太教徒对圣经的不同解读）是问题的一部分而非解决方法。

王宇：我很同意 Hillel Cohen-Bar 教授关于巴以冲突中宗教影响的分析。以前我们大多认为巴以冲突是恐怖主义性质的，或者是国际间冲突、政治冲突、经济冲突以及土地和水资源之争。但相比于这些，持续两千多年的宗教冲突更突显也更难以解决。我也认为，以色列国成立后的第一代人是世俗主义的犹太人，但之后的则更多是信仰宗教的犹太人。我对前景感到很担忧。

余纲正：我不否认宗教的基础性作用，但我们越来越担心不断膨胀的宗教民族主义，在这种背景下只能被动地接受国家的一切，而对国家的批评越来越不可能。巴以冲突的双

方都有这种情况。但我认为使战争升级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种族之间的排斥——冲突双方将宗教作为不愿妥协的借口。

Hillel Cohen-Bar: 我认为耶路撒冷宗教化的巅峰在上世纪 90 年代，2018 年开始已经在下降了。但我很难去讲未来会如何，因为存在许多世俗的右翼人士。至于宗教是不是阻碍和平进程的借口，如果宗教不重要，那么宗教话语就不会得到民众的支持和追随，反之则证明宗教就是人们的身份认同之一。这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中都是如此。

Uri Ben-Eliezer: 为何特朗普会支持以色列？是因为这是美国的政治传统，因为美国的基督教福音派？还是因为强大的犹太游说集团？特朗普欣赏以色列的政治方式？特朗普是内塔尼亚胡的朋友，还是因为以色列是美国的战略伙伴？

余纲正：在我的发言中上述要素都有涉及，但更加强调基督教福音派的影响和战略资产这两个因素。当然，传统的游说集团以及特朗普、库什纳和内塔尼亚胡之间的个人关系同样扮演了重要角色。您提到的特朗普如何从以色列身上学习“恐吓”（terror）的政治方式，可能会成为解读特朗普政策新的研究视角。

王锁劳副教授在会议总结时表示，本期工作坊是一次成功的、高层次的会议，与会专家学者就以色列的国家定位及未来走向进行了深层次的讨论和交流，对以色列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中国和以色列对彼此都具有重要意义，2017 年两国宣布建立创新全面伙伴关系。中国关注以色列的发展与动向，未来将会有更多机会来探讨中东和以色列的相关议题。